

# 中国财经高等教育百年历程回顾 与一流之路展望<sup>\*</sup>

陈益刚 白宇 陈信朋<sup>\*\*</sup>

**摘要：**中国近代大学是在风雨如晦、内困外侮的艰难时局中发轫的，是中西高等教育激荡相生的时代产物。回顾高等财经教育的百年历程，从上庠到书院的历史演进，从学堂到大学堂再到近代大学的曲折生成；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学科转向，从法商教育到财经学科再到经济管理学科的传承创新；从学科到重点学科再到世界一流学科的一步推进，从专业到特色专业再到世界一流专业与“双万计划”的精心打造。道路崎岖坎坷，经验弥足珍贵。展望未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财经教育扑面而来，一流之路道阻且长。我们需要立足新时代，引领新财经发展趋势；扎根中国大地，把握新财经的时代内涵；和谐共生，构筑新财经一流学科与一流专业建设新格局；协同共进，铸就新财经高质量发展共同体。

**关键词：**财经高等教育 教育史 新财经 一流学科 一流专业

2018年是北京大学“双甲”之年，学校召开隆重热烈的纪念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120年来，北京大学栉风沐雨、百廿长青，守正创新、引领未来。以北京大学为代表，我国大学已经走过120年的风雨历程，从肇始、嬗变、新生到壮大，历尽内困外侮、动荡时局，饱受战火摧残、兴废变故；遭遇艰难曲折、困顿前行，更是欣逢盛世、枝繁叶茂。与此相生相伴，我国财经高校相继进入“期颐之年”。上海财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双一流’建设中的中国实景、一流内涵和民族特色研究”（17YJA880012）、西南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高等财经教育研究项目“我国高等财经教育百年历程的回顾与展望”（JBK18FG07）的研究成果。

\*\* 陈益刚，男，四川射洪人，西南财经大学发展规划处副研究员；白宇，女，四川旺苍人，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助教；陈信朋，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锦城学院金融学院本科生。

经大学于 2017 年庆祝百年华诞, 世纪传承, 薪火百年。在此前后, 部分财经院校相继举办校庆典礼, 如江西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分别于 2013 年、2015 年迎来 90 年华诞。春华秋实, 硕果累累; 百年传承, 风骚各领, 彰显出盛世的繁荣昌盛。

当前, “双一流”建设风帆正举, 一流本科教育整装出发。全国教育大会的胜利召开、《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的闪亮登台、新时代全国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和“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倾力推出, “金专”“金课”“建高地”的滔滔大势, 高等教育再次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鉴古知今, 继往开来。以此为契机, 回顾我国财经高等教育的百年曲折历程, 总结新中国 70 年来财经高等教育的辉煌成就, 展望财经学科的一流创新发展之路,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 一 古今之变: 从上庠到书院、从大学堂到大学

### (一) 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回顾

高等教育是相对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而言的一种高级、高阶教育, 又称为大学教育。在不同国家和历史阶段, 其内涵不尽相同, 主要有三类。一是各类工具书的界定, 如《简明教育辞典》将它定义为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上的各种专业教育。<sup>[1]</sup> 维基百科将之定义为一切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 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二是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的不同规定,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2015 年) 规定, “本法所称高等教育是指在完成高级中等教育基础上实施的教育”。三是专家学者的多种观点主张, 如熊明安认为高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高级阶段的教育, 是一种专门教育; 潘懋元认为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 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 王冀生认为高等教育是专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继续, 有四种基本类型、两个基本体系。<sup>[2]</sup> 由于高等教育的多重属性, 关于其历史起源的学术观点众说纷纭, 主张各异。

(1) 上古三代说。在教育史研究中, 一般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阶段。其中, 古代部分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到清朝中叶为止, 近代部分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 现代部分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 当代部分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上古三代说”认为我国大学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 有虞氏的上庠、夏后氏的东序、殷商的右学、西周的辟雍和泮宫、先秦的私学和西汉的太学, 这些都具备高等教育的雏形。熊明安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历经了一个十分漫长的演进过程, 可以分为萌芽(夏、商、西周)、形成(春秋战国)、正式确立(两汉与魏晋南北朝)、发展(唐宋)、衰落瓦解(元明清)等几个阶段。<sup>[3]</sup> 毛礼锐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居于世界教育史的领先地位。如果殷商时代就有了大学, 那么在公元前十五六世纪就有了大学; 如果从春秋战国私学算起, 那么在公元前 5 世纪末至公元前三世纪就有了私立大学; 如果从汉武帝设立太学算起, 那么在公元前 124 年便

无可置疑地有了正式大学。<sup>[4]</sup>

(2) 移植说。我国近代大学是西学东渐、旁采泰西的历史产物，是对西方近代大学制度的移植模仿。蔡元培先生指出，“然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然则往昔之太学国学，直当以高曾祖视之。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sup>[5]</sup>梅贻琦先生认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sup>[6]</sup>有学者指出，“‘大学’二字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悠久的名词，但和目前的大学名目虽同，性质却是各异。中国有这种现代式的教育机关——大学自1898年为始。”<sup>[7]</sup>至于谁是我国第一所近代大学，也有不同说法。<sup>[8]</sup>从历史脉络看，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是近代高等教育的发轫，1895年设立的中西学堂头等学堂和1896年设立的正阳门南学上院，是近代大学的雏形，但都不是独立设置。京师大学堂被公认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sup>[9]</sup>

(3) 双重和多重起源说。作为后发展国家，我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移植日本、借鉴德国和模仿美国的制度变迁。<sup>[10]</sup>新中国成立之后，又经历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和改革开放后面向欧美学习与借鉴的过程。双重起源说认为，近代大学的起源有一定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历史基础是从传统书院和学校向现代大学转型，现实基础是直接来自西方国家引进生成，是双重起源。<sup>[11]</sup>近代高等教育虽然与古代大学具有传承关系，但有着古与今、专制与民主、古典与现代等质的不同。<sup>[12]</sup>主要有两大脉络：一脉是以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近代高等教育；另一脉是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代表的红色高等教育，具有红色基因的高等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sup>[13]</sup>

## （二）从大学堂到大学

(1) 学堂、大学堂和专门学校。近代学堂是由高等、中等再到初等，自下而上、逐步普及推广的。其办学质量有优有劣，办学时间有长有短，社会影响有大有小。1895~1898年，全国出现学堂19所。1902~1911年，学堂由700余所快速发展到52500所。大学堂方面，1901~1903年，设立有山东大学堂、浙江求是大学堂、苏州省城大学堂、河南大学堂、天津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江西大学堂、陕西关中大学堂。1903年，清廷下令除保留京师、北洋、山西三所大学堂外，其余各省大学堂一律降格为高等学堂，每个省城一所，相当于大学预科，分为文、理工、医三类。1909年，全国有大学堂3所，其中京师大学堂200人、北洋大学堂114人、山西大学堂435人。<sup>[14~15]</sup>

(2) 由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是在积弊丛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旧学与新学对立的背景下创建的，在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的风雨中，经历戊戌大学（1898~1901年）、壬寅大学（1902~1911年）、北京大学（1912年至今）等三个阶段，筚路蓝缕，最终走出逆境，成为我国近代大学的领航者。

1896 年, 清朝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 首次提议设立京师大学堂。1898 年, 在变法维新运动中, 创建京师大学堂一事再次被提出并得到批准。京师大学堂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创办之初的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 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但由于受到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等事件的严重影响, 京师大学堂一度停办。<sup>[16]</sup> 1902 年, 京师大学堂恢复, 按照《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 大学堂分为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 设七科三十五目。1903 年, 修订后的《奏定大学堂章程》颁布, 由科目到科门, 分设八科六十四门, 增设经学科; 大学院改名通儒院; 大学预备科由政、艺二科改为三类。1910 年, 分科开学, 除医科外, 其他七科正式开办; 商科学制三年, 其他各科学制四年。1911 年, 京师大学堂再次停办。

1912 年, 中华民国成立, 5 月, 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1917 年 1 月, 蔡元培出任校长, 采取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 进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综合改革。改革后, 由原来的文、理、法、工、商五科变成文、理(法)两科, 经过“成立—重组—再改革”, 建立起研究所。从此, 北京大学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现代高等教育的领航者。<sup>[17]</sup>

## 二 学科转向: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

### (一)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

(1) “四部之学”的流变。“四部之学”即是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我国古典文献的分类方法。作为一个拥有 5000 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思想文化辉煌灿烂、博大精深, 古典文献浩如烟海, 卷帙浩繁。对文化典籍的分类、整理, 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老子作周朝守藏室史、孔子删述六经及六艺分类法的最早运用。在我国古代众多图书分类法中, 影响最大的是六分法和四分法。六分法由西汉刘向、刘歆父子设立, 将图书划分为六大类。四分法有一个演进变化的过程, 历经《中经》《中经新薄》和《四部书目》的变化, 得以正式确立“经、史、子、集”的顺序。清乾隆时, 纪昀等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采用四部分类法, 由此, “四分法”成为近代影响最大的学术分类方法。<sup>[18]</sup>

(2) “七科之学”的确立。“七科之学”即“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科目。历经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 西方社会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学、艺术、科学等各个领域掀起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在高等教育方面, 从中世纪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发轫, 历经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及德国柏林大学的演进, 逐渐形成了西方近代学术分类体系。这一分类体系, 主要以学科为标准, 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 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大领域, 自然科学包括数、理、化、天文、地理、地质、生物, 社会科学包括文、史、哲、政、法、经、逻辑、社会。<sup>[19]</sup>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学科转向, 经历了“六科”到“八科”“十

科”再到“七科”确立的过程。“六科”即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在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进程中，西方的学科体系开始导入。<sup>[20]</sup>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新思想、新学说和新科技不断涌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已不能囊括，人们开始探索构建新的分类方法。如，梁启超的《日本书目志》（1895年），分十五类，每类分子目；《西学书目表》（1896年），分学、政、教三类。<sup>[21]</sup>在学科建制上，京师大学堂初创之时，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大类，其中普通学科包括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和初等的算学、格致学、地理学及文学、体操，专门学科包括高等的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分科设目，共七科三十五目。张之洞提出“八科分学”，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大学令》，废除经学科，格致科改称理科。从此，文、理、法、商、医、农、工的“七科之学”正式确立。<sup>[22]</sup>

## （二）法商教育的兴起与滥觞

### 1. 法商教育的兴起（1898~1911年）

一是京师大学堂与法商。京师大学堂是最早开设法政、商科的近代大学。<sup>[23]</sup>京师大学堂创设时，政治学、商学作为专门学科被纳入教学体系中。《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商务科下设立簿记学、产业制造学、商业语言学、商法学、商业史学、商业地理学等六目。《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商科分设三门，有银行及保险学、贸易及贩运学、关税学。1910年，包括法政科、商科在内的七科开学，商科下设银行保险一门，学制三年。二是法科与经济学。法政教育是清末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sup>[24]</sup>大学堂设置法学院，法学院下设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基本上是借鉴日本的法政教育，课程以日本和西方的法律、政治、经济学以及晚清时期新修订的民法典法规为主。在共同课程设置之外，针对经济学人才培养，设置有专门的教学内容，如通商、理财等。<sup>[25]</sup>三是商科与实业学堂。近代高等商科教育是对美日商科教育的模仿借鉴，洋务运动在教育上的主要措施是兴办学习洋文和洋枪、洋炮、洋机器的专科学校，出现一批由官办或民办的高等（中等或初等）商务实业学堂。<sup>[26]</sup>

### 2. 法商教育的滥觞（1912~1949年）

（1）概述。1912~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相继颁发《壬子学制》及各种法规与法令，总称为《壬子·癸丑学制》，主要是参照日本教育体制。其中，高等教育分大学院、大学（本科、预科）、高等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大学6~7年（预科3年、本科3~4年）；大学毕业后才能进入大学院，肄业年限不定。<sup>[27]</sup>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了“新学制”（壬戌学制）；1924年，又公布《国立大学校条例》。1927年，拟具《大学区制组织条例》，通过《大学院组织法》。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了《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和《专科学校组织法》。1931年颁行的《专科学校规程》规定，高等教育机关分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三类。大学分为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等八类，具备3个学院以上者，方称得大学，且3者中必有1

理、农、工、医学院；不满 3 学院者，称为独立学院，修业年限除医学院为 5 年外，其余为 4 年。大学及独立学院，设立研究所，研究所分设若干学部。专科学校分工、农、商、医、艺术、音乐、体育，修业年限为 2~3 年。<sup>[28]</sup>

1937 年 7 月 7 日，全面抗战爆发。在国民党统治区，采取了“内迁并调整院校科系、与区域开发相结合、发展与扩充理工农医实科”的举措，在逆境中诞生了以西南联合大学（1937~1945 年）为杰出代表，包括国立西北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在内的一大批高校，彰显出自强不息、弦歌不辍的大学精神，成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以高级干部教育为中心任务的高校，如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及各分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华北联合大学等。1945~1949 年，国民党统治下三民主义教育逐渐崩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教育蓬勃发展。1946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战时教育方案》，在东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等地，整顿大学和专门学校，创办了各种专业学校和干部学校。著名的有延安大学、东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等。<sup>[27~28]</sup>此外，在日伪统治区有 23 所高校，其中大学 13 所，法政商科方面有新京法政大学、私立奉天商科学院等。<sup>[27]</sup>

(2) 专门学校与法政商科教育。1912 年，民国政府的《专门学校令》规定，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分设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语等 10 类专门学校。根据举办者的不同，分为国立（教育部管辖）、公立（地方）和私立三种。当年，公立和私立专门学校的数量见表 1。

表 1 民国初年各类专门学校数量

单位：所

| 类型 | 法政 | 医学、药学 | 农业 | 工业、商船 | 商业 | 美术 | 外语 | 其他 |
|----|----|-------|----|-------|----|----|----|----|
| 公立 | 36 | 7     | 9  | 18    | 8  | 1  | 6  | 2  |
| 私立 | 27 | 8     | 1  | 1     | 2  | 1  | —  | —  |

资料来源：据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整理。

法政专门学校。分为三科，即法律科、政治科、经济科，政治、经济二科不分设者，必须另设政治经济科。经济科的科目设有宪法、行政法、经济史、货币论、银行论、财政法、财政史、农业政策、工业政策、商业政策、交通政策、殖民政策、统计学、保险学、簿记学、民法概论、商法、外国语，并要求在商业史、商业地理、国际公法、刑法总论、政治学、交易市场论、仓库及税关论中“选择一种以上习之”。政治经济科的科目设有宪法、行政法、政治学、刑法总论、国际公法、民法概论、商法概论、货币银行学、农业政策、工业政策、商业政策、交通政策、殖民政策、财政学、统计学、簿记学、外国语，要求在法学、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商业史、保险学中“选择一种以上习之”。

商业专门学校。以“养成商业专门人才为宗旨”，本科修业年限为三年；设预科，修业年限一年；为本科毕业生设研究科，年限为一年。科目设置有商业道德、商用文、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历史、簿记（商业簿记、银行簿记）、工学（机械工学、工厂管理法）、商品学、经济学（经济原论、货币论、银行论、投机论、恐慌论、商业政策）、法学（民法、商法、破产法、商事行政法、国际法）、商业学（商业通论、保险论、银行论、关税论、海陆运输论、买卖论、仓库论、交易所论）、统计学（实用统计学）、会计学、财政学、商业实践、英语、第二外国语（法德俄日之一）、蒙藏语（随意科）。民国时期商业专门学校相关情况见表2。

表2 民国时期商业专门学校

| 校名         | 类别    | 校址   | 创办年份 | 教师数(人) | 学生数(人) |
|------------|-------|------|------|--------|--------|
| 国立上海商学院    | 公立院校  | 上海市  | 1917 | 64     | 451    |
| 广东省立法商学院   | 省市立院校 | 广州市  | 1934 | 95     | 1047   |
| 山东省立商业专科学校 |       | 济南市  | 1948 | 20     | 337    |
| 四川省立会计专科学校 |       | 成都市  | 1942 | 29     | 255    |
| 私立重辉商业专科学校 | 私立院校  | 南京市  | 1944 | 22     | 296    |
| 私立达仁商学院    |       | 天津市  | 1939 | 19     | 182    |
| 私立光夏商业专科学校 |       | 上海市  | 1947 | 21     | 82     |
| 私立建国法商学院   |       | 南京市  | 1940 | 48     | 493    |
| 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       | 上海市  | 1937 | 37     | 521    |
| 私立求精商学院    |       | 重庆市  | 1946 |        | 542    |
| 私立上海商业专科学校 |       | 上海市  | 1948 | 20     | 99     |
| 私立新中国法商学院  |       | 上海市  | 1947 | 24     | 92     |
| 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 |       | 上海市  | 1943 | 54     | 516    |
| 私立重华法商学院   |       | 重庆市  | 1938 | 21     | 385    |
| 东北商业专门学校   |       | 独立院校 | 长春市  | 1949   | 84     |

资料来源：赵亮宏、赵学文、韩振乾《中国高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附录7，第941~947页。

(3)《大学科目表》与经济学、商学教育。1938~1948年，民国政府先后进行三次大的课程修订。第一次课程修订在抗战初期，相继编订了文、理、法、商、农、工、医7个学院的课程，共50个学系，于1938年、1939年公布。第二次课程修订在抗战末期，采取重点修订办法，范围仅涉及文、理、法、师范4个学院，共31个学系，于1944年公布。第三次修订始于抗战胜利后，涉及文、理、法、商、农、工、医、师范等8个学院，共54个学系，于1948年公布。<sup>[29]</sup>《大学科目表》的制订会聚了著名的专家学者，如经济学、商学的科目设置，马寅初、杨端六、方显庭等一批著名学者参与其中。《大学科目表》于1940年出版，1946年再版，是大学课程开设的指导性书目，对大学各学院及分院开设科目进行了规定，包括共同必修科目、选修科

目以及科目、学分、学期、学时及具体要求。在学院、学系共同必修科目、选修科目之外,还有一些不计学分的必修科目。<sup>[30]</sup>其中,法学院、商学院必修与选修课程数量见表 3。

表 3 《大学科目表》中法学院、商学院必修与选修课程数量

单位:种

| 学院  | 学系                               | 必修课程 | 选修课程 |
|-----|----------------------------------|------|------|
| 法学院 | 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              | 9    | —    |
|     | 经济学系                             | 12   | 21   |
| 商学院 | 银行学系、会计学系、统计学系、国际贸易学系、工商管理学系、商学系 | 9    | —    |
|     | 银行学系                             | 15   | 15   |
|     | 会计学系                             | 13   | 14   |
|     | 统计学系                             | 12   | 18   |
|     | 国际贸易学系                           | 16   | 17   |
|     | 工商管理学系                           | 16   | 19   |
|     | 商学系                              | 14   | 19   |

(4) 财经系科。民国初期,全国大学的学科设置中,法学院以法律、政治、经济并重,故法学院大多数设三个系。全国共有 16 所商学院,商学、会计、银行、工商管理,几乎每校都有。<sup>[7]</sup>到 1948 年,全国共计 207 所高校,设置有财经系科的高校 80 所、系科 21 种、161 个点,以经济系、工商管理系、银行系(科)、会计系(科)居多。<sup>[31]</sup>

### 三 财经学科的初步建立到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大繁荣大发展

#### (一) 财经学科的建立和财经专业教育探索 (1949 ~ 1965 年)

##### 1. 院校调整与财经院校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先后进行两次大规模的院校调整。第一次是从 1952 年下半年至 1953 年,院系调整后,绝大多数省份有一所综合大学和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高校由 1949 年的 205 所减少为 1953 年的 181 所。第二次是 1955 ~ 1957 年,经国务院批准,在武汉、兰州、西安、成都等城市新建一批高校,1957 年,全国高校数量达 229 所。1958 ~ 1960 年,受“左”的影响,高校数量急剧增长,1960 年达到 1289 所。1961 ~ 1963 年,裁并为 407 所。1965 年,全国有普通高校 434 所。

院校调整后,按照办学类型分为综合、工业、师范、农林、医药、财经、政法、语文、艺术、体育和其他等十一类。按大区布局,在东北、华东、中南和西南设置 4

所财经院校，分别是东北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学院、中南财经学院和四川财经学院。其后，各个省份和中央部委先后设置了一批财经类院校。1957年，全国共有5所财经院校，10所综合性大学设有财经类专业，财经本科在校生1.07万人，约占全国本科在校生总人数的2.5%。调整中，部分文科专业被砍掉，财经、政法、哲学等社会科学的多数学科、专业受到削弱，财经院校占比在5%以下。<sup>[31]</sup>“文革”后，财经院校仅存2所，在校生不足7000人。

## 2. 财经专业设置与调整

专业调整是与院校合并同步进行的。国家对高校专业设置进行了若干次调整，大量设置工科、农科等专业，文科、政法、财经专业所占比重急剧下降。调整后，财经专业教育取代法政商科教育。1953年，高校设置专业215种，其中财经专业13种。1953~1957年，设置专业323种，其中财经专业12种。1958~1962年，根据“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原则，由中央、教育部进行统一规划，具体专业设置由地方决定，专业种类与专业点数急剧膨胀。1962年，全国高校专业数增加到627种，专业点达到3703个。其中，财经专业25种、106个点。1963年，《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和《高等学校绝密和机密专业目录》颁布，这是新中国第一次由国家统一制定专业目录。通用专业目录分为工科、农科、林科、卫生部分、师范部分、文科、理科、财经部分、政法部分、体育部分、艺术部分等11类，共373个专业（不包括绝密、机密和试办），其中政治经济学专业（060012）列入文科部分，财经部分包括国民经济计划、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贸易经济、财政金融、统计学、会计学、对外贸易经济、世界经济、经济地理10个专业，允许部分高校将财政、金融分设2个专业。1965年，全国设有601种专业，2833个专业点。其中财经专业21种，91个点。<sup>[31~32]</sup>这一时期，财经专业设置的变迁具体见表4。

表4 财经专业设置变迁

| 科(门)类 | 专业                             | 时间    | 备注                    |
|-------|--------------------------------|-------|-----------------------|
| 商科类   | 3种:银行及保险、贸易及贩运、国税              | 1904年 | 共8科、46种专业             |
|       | 3种:法律、政治、经济                    | 1912年 | 共7科、69种专业             |
|       | 6种:银行、保险、外国贸易、领事、海关仓库、交通       |       |                       |
| 财经类   | 13种                            | 1953年 | 社会科学专业50种             |
|       | 25种                            | 1962年 | 社会科学专业129种            |
|       | 10种                            | 1963年 | 社会科学专业101种            |
| 经济管理类 | 99种                            | 1985年 | 社会科学本科专业398种          |
|       | 48种                            | 1987年 | 社会科学本科专业214种          |
| 经济学   | 下设经济学、管理学2个二级类,其下分别设置19个、12个专业 | 1993年 | 10个门类,下设二级类71个,504种专业 |

续表

| 科(门)类 | 专业                                | 时间     | 备注   |
|-------|-----------------------------------|--------|--|
| 经济学   | 4 种: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           | 1998 年 | 11 个门类, 下设 71 个二级类, 249 种专业  |
| 理学    | 统计学                               |        |  |
| 管理学   | 工商管理下设 6 个专业                      |        |  |
| 经济学   | 4 个二级类, 10 个专业, 财政学、金融学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 2012 年 | 12 个学科门类(不含军事学), 92 个专业类和 506 种专业。分基本专业和特设专业两大类, 同时设置 62 种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
| 理学    | 统计学类下设 2 个专业                      |        |  |
| 管理学   | 工商管理类下设 10 个专业, 工商管理、会计学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        |  |

### 3. 财经人才培养

(1) 本专科人才培养。1949 ~ 1965 年, 高等院校培养的各类毕业生 155.44 万人, 主要以工科、师范、医学、农林和理科为主。财经专业的毕业生仅为 7.13 万人, 占总量的 4.59%。从年度分布看, 院校与专业调整之后, 财经专业的毕业生大幅度减少, 1958 年仅有 2349 人, 之后略有增加, 但到了 1965 年, 再次降至最少, 仅有 2079 人 (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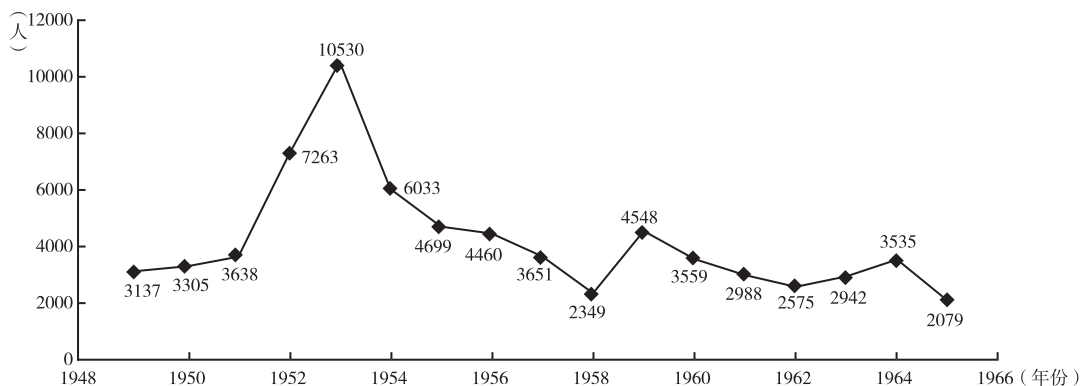


图 1 1949 ~ 1965 年财经专业毕业生人数

(2) 研究生教育。1949 ~ 1965 年是研究生教育的起步期, 招生人数不多, 管理也较为松懈。1951 年采用保送审批办法, 招收 276 人。1952 年, 由于大规模院系调整带来了相应的问题, 停止招生。1953 年, 高等教育部提出研究生教育目标是培养高校的师资和科学研究人才, 不仅能讲授一两门专业课程, 还要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1957 年, 实行四年制。1962 年, 调整为三年制, 按照保证质量、严格要求的方针, 研究生教育进入自主培养、规范培养、有序发展的良性轨道。1949 ~ 1965 年, 研究生毕业生 16397 人。其中, 财经专业 1662 人, 占比 10.14%。从年度分布看,

1955年最多,为358人(见图2)。1959~1961年停止招生。“文革”后,研究生教育停止,直到1981年恢复,中断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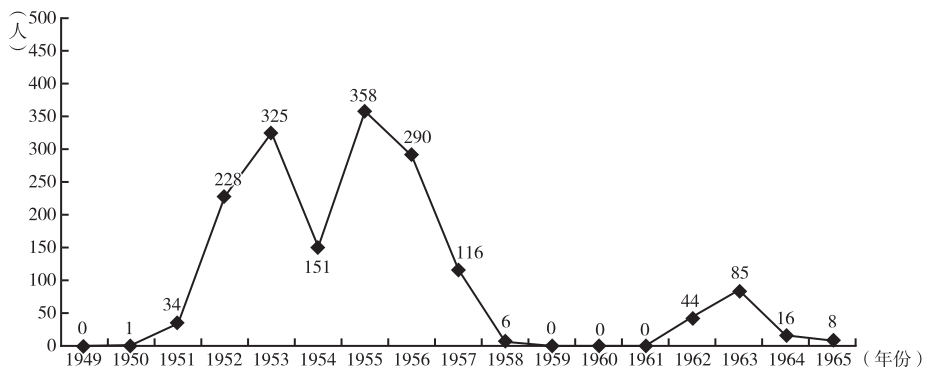


图2 1949~1965年财经专业研究生毕业人数

## (二) 经济学、管理学学科与专业建设并举的黄金阶段(1978年至今)

### 1. 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与普及化教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把高等教育放在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战略地位,相继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1995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5年)、《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2018年)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献,启动“211工程”“985工程”“协同创新”“双一流”建设和“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及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重大项目。高等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变革,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成就,构建起“规模宏大、体系完备、功能齐全、影响深远”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体系。<sup>[33]</sup>在管理体制上,从“条块分割”到“以块为主”,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以地方为主的办学管理模式;在办学格局上,逐步建立起了以普通高等教育为主体,成人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网络教育协调发展的多层次多类型的体系;在高校内部,逐步突破旧的模式,建立起“学校—学院(所、中心)—系”的两级、三层的治理结构。

1978年,全国有高校598所,分为综合、理工、农业、林业、医药、师范、语文、财经、政法、体育、艺术、其他12种类型。之后,高校数量逐年平稳增加,1985年达到1016所,首次突破千所关口。2000年后,增速加快,2008年突破2000所关口,达2263所。2017年,高校达2631所,是1978年的4.4倍。受益于改革开

放的强大驱动力,得益于财经学科“经世济民”的内在驱动力,社会对高层次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日趋旺盛,经济学、管理学科成为社会科学的“显学”,财经热持续不断,财经学科成为高校学科与专业设置的普遍抉择。财经院校的增长速度更快。1978年,财经院校仅为21所,少于综合、理工、农业、医药、师范院校。2008年,财经院校增加到237所,仅次于理工、综合类而高于师范、医药和农林类。2017年,财经院校增加到265所,是1978年的12.6倍。

## 2. 从经济学到经济学、管理学

(1) 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1981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恢复之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便着手制定学科专业目录。1983年颁发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10个门类,设置63个一级学科、638个二级专业,其中,经济学24个专业。1990年,增设军事学,设11个学科门类,72个一级学科,列出620种学科专业,34种试办专业。其中经济学增加到27种专业。1997年,增设管理学,设置12个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增加到89个,二级学科减少到386种。其中,经济学门类下设置2个一级学科、16个二级学科。工商管理作为一级学科设置在管理学门类,工商管理下设4个二级学科。2011年,增加艺术学门类,共13个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增加21个,设置一级学科110个,淡化二级学科。

(2) 本科专业目录。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变革,高校的本科专业目录处于不断调整变化中,分别于1987年、1993年、1997年、2012年进行调整。1987年颁布的文、理、工、农林、医药专业目录,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由国家组织的专业目录。修订后专业数由1343种压缩为671种。《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中,设12个专业类、214种专业。其中,在“经济、管理学类”下设48个专业,包括异名专业6个,个别学校设置专业11个,试办专业14个。<sup>[34-35]</sup>1993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规定了专业划分、名称及所属门类,设置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10大门类、71个二级类,504个专业。经济学门类下设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两个二级类,31个专业。其中,在经济学类下设19个专业,工商管理类下设12个专业。<sup>[36]</sup>1998年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由学科门类、类和专业构成,设置11个学科门类(不含军事学)、71个二级类和249个专业。学科门类设置上,与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保持一致。经济、管理学科专业的调整幅度较大。首先是增设管理学门类,其下设置5个二级类,在工商管理二级类下设6个专业;其次是经济学专业数量大幅度减少,经济学门类下仅设1个二级类和4个专业;最后是统计学作为二级类和专业,设置在理学门类,可授予理学或经济学学士学位。<sup>[37]</sup>2012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增设艺术学门类,设置12个学科门类(不含军事学)、92个专业类和506种专业。将专业分为基本专业和特设专业两大类,其中,基本专业352种、特设专业

154种。同时,设置了62种国家控制布点专业。经济门类下,设4个二级类、10个专业,财政学、金融学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理学门类的统计学类下,设2个专业;管理学门类的工商管理类下,设置10个专业,工商管理、会计学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3) 专科专业目录。专科教育贯穿我国近现代教育史的全过程。<sup>[38]</sup>1994年,原国家教委颁布《普通高等学校工程专科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文科专科专业目录》,修订后的文科专科专业目录将原来308种文科专业压缩为180种,分为14个大类,在经济管理类下设有28个专业。<sup>[39]</sup>2004年,《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试行)》颁布,分为专业大类、专业类、专业名称三个层次。在财经大类下,设财政金融、财务会计、经济贸易、市场营销、工商管理5个专业类、36个专业。2015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设置专业大类、专业类、专业及对应职业,衔接中职专业,接续本科专业。在财经商贸大类,设置财政税务、金融、财务会计、统计、经济贸易、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物流9个专业类、47个专业。

### 3. 从学科建设到重点学科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20世纪80年代,为突破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僵化束缚,以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和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为代表,率先对学科建设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在内部治理上,逐渐从“校一系一教研室”的计划管理模式向“校一院一系”现代治理模式转变。在实践探索与理论建构上,向学科建设模式转向。所谓学科建设,是指高校为提高教学、科研及服务社会水平而按特定的学科方向所进行的基础性与发展性工作。重点学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国家、地方或高校确定的优先发展的学科领域;狭义特指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在高校择优确定并安排重点建设的学科。198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是高校高水平的象征,具有核心地位和骨干引领作用,是教学科研高地和核心竞争力的展现。重点学科比较集中的高校将自然成为教育中心,以及科学研究的中心。随着“211工程”“985工程”的启动,学科建设逐渐占据高校工作的龙头地位,重点学科建设更是高校的重中之重。自1987年启动到2014年取消评选,国家重点学科评选工作进行过三次。与国家重点学科相呼应,地方政府和高校也构建起省级、校级重点学科,形成了以国家级、省部级和校级重点学科为架构的三级重点学科体系。

“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是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行动计划。2017年,国家三部委公布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42所大学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95所高校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其中,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17所高校的25个财经学科入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法学入选)。在高校分布上,综合性大学10所,财经类大学5所,师范

类大学 2 所；在学科分布上，理论经济学 3 次，应用经济学 6 次，工商管理 4 次，统计学 8 次，商业与管理 2 次，会计与金融、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各 1 次。重点学科建设以及一流学科建设的相关情况参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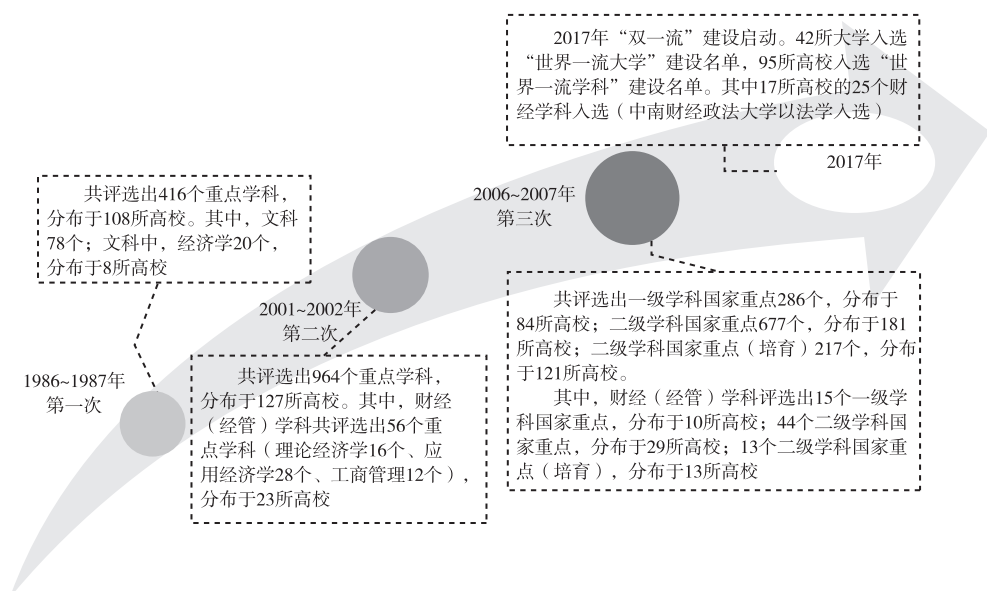


图 3 从重点学科到世界一流学科

#### 4. 从专业建设到特色专业建设再到世界一流专业建设和“双万”计划

立德树人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专业建设则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基石。从专业建设到特色专业建设再到世界一流专业建设和“双万”计划出台，逐渐形成了以国家级、省部级、校级特色专业与精品课程建设为主线的三级教学体系。普通高校专业设置调整，既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又受到学科与专业目录的制度约束，也是高校与社会需求互动生成的基本依据。专业设置由专业种数和专业点数构成，专业种数是专业内容的细化，反映出专业的知识包容度；专业点数是专业布局的形态，反映出专业的社会欢迎度。财经学科的超常规发展，最直观生动地反映为财经专业设置种数与点数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之初，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严重失调，财经教育十分短缺。本科生中，财经类人才仅占全国 4.2%。<sup>[40]</sup> 1984 年，普通高校财经类专业 42 种，专业点数 725 个，分别比 1981 年增长 13.5% 和 148.3%。厦门大学、南开大学等综合性大学相继建立经济学院或经管学院。1985~1986 年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点新增 204 个，其中财经专业点新增 88 个，占新增专业点的 43.14%。1986 年，财经专业点数由 1980 年的 248 个增加到 1698 个。<sup>[41]</sup> 1987 年，财经类专业种数 45 种，专业点数有所调整，降至 1432 个。之后，经济学的专业种数、点数保持平稳增长。1995 年，经济学的专业种数 54 种、专业

点数 3093 个。2000 年，经济学、管理学的专业种数与专业点数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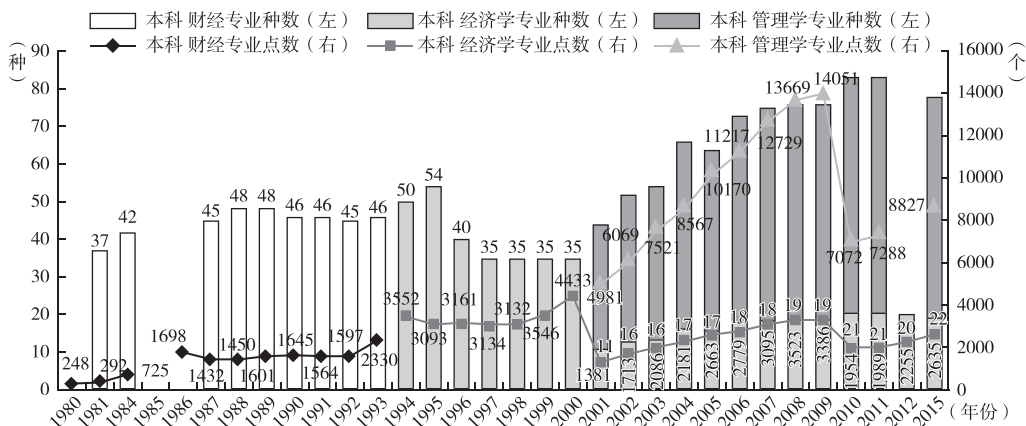


图 4 财经专业种数及专业点数变化趋势

特色专业是指一所高校某一专业，在教育目标、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条件和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办学水平和鲜明的办学特色，已产生较好的办学效益和社会影响，是一种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专业。2007~2011 年，教育部分七批次审核批准 3454 个特色专业。其中，财经特色专业 16 种，累计达 265 个，分布于 128 所高校，主要有会计学、金融学、经济学、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统计学、市场营销。其中，中央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分别有 7 种，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分别有 6 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山东经济学院分别有 5 种。<sup>[42]</sup>

2018 年 6 月 21 日，“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发表《成都宣言》。陈宝生部长指出，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不牢、地动山摇。会议之后，教育部出台“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全面展开。2019 年 4 月，“双万计划”发布，计划在 2019~2021 年，建设 10000 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和 10000 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中，拟建设数量最多的是工商管理类，674 个。此外，经济学类 126 个、财政学类 38 个、金融学类 206 个、经济与贸易类 144 个、统计学类 85 个。

#### 四 新财经：由大到强的一流创新发展之路

##### （一）传承创新，引领新时代新财经发展趋势

自主与依附是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发展的基本特征。<sup>[43]</sup> 回顾高等财经教育百年历

程,总是与国家兴衰和民族命运紧密交织、相生相长。鸦片战争是我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也是民族灾难的开始。国家内困外侮、山河破碎,百姓生灵涂炭、饥寒交迫,救亡图存、自强自立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诉求和自觉行动。在如此艰难时局下开启近代大学的历程,倍加艰难坎坷、曲折多变。创办、停办、续办、改组、合并、裁撤,命运多舛;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立,身份各异;学堂、大学堂、专门学校、大学和学院,类型多样。从上庠到书院的历史演进,从学堂到大学堂再到近代大学的曲折生成;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学科转向,从法商教育到财经学科再到经济管理学科的传承与创新;从学科到重点学科再到世界一流学科的前进,从专业到特色专业再到世界一流专业与“双万计划”的精心打造。筚路蓝缕,既让人倍感庆幸骄傲,也需要总结经验得失。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既充满着严峻挑战、激烈竞争又彼此依存、深度融合的大格局中,各国政府竞相将一流大学作为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制高点。处于第一方阵、领跑水平的美国及其哈佛、耶鲁、斯坦福等一流大学不断变革图强,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纷纷出台多项重大举措,实施高等教育强国(强区)计划。世界高等教育呈现强者要更强、后者更发奋的竞争态势,呈现双边与多边互动相交织、相交融的生动场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全球化趋势,我国相继实施科教兴国、人力资源强国和高教强国战略,先后启动“211工程”“985工程”“协同创新”“双一流”“一流本科教育”等重大工程,一跃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成为主要参与者、力量贡献者和趋势引领者。展望未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不断加速,新形态、新业态和新生态日新月异。新时代孕育新机遇,新变革催生新财经。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建设为主导的新一轮改革与创新浪潮势如长虹,新财经扑面而来。

## (二) 扎根中国大地,把握新财经的时代内涵

新财经与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等一样,是基于国家战略新需求、国际竞争新形势、立德树人新要求而提出的改革新方向,具有理念新、要求新、途径新的时代内涵和战略型、创新性、系统化与开放式的重要特征。<sup>[44]</sup>“新文科代表一种融合趋势,是一次新的科学技术与人文话题相融合。”<sup>[45]</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指明了新财经高等教育的基本遵循、发展方向、根本路径和时代要求。

新财经相对于财经。100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来,财经学科历经法商教育、专业教育和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传承与创新,直接服务于金

融、会计、工商、贸易、财政、税务、投资等事关国计民生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与经济社会建设深度融合、相向偕行，形成了“体系庞大、特色鲜明，功能突出、贡献巨大”的显著特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经迈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方位。新财经是新时代财经高等教育的崭新形态，是适应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大势、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趋势、呼应国内外高等教育态势的时代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价值指向。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地影响着财经高等教育，要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基础上，重塑甚至颠覆传统学科过时和落后的理论，树立新财经的一流发展观、开放合作观、学科共同体观，不断改革和创新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拓展和深化财经学科的发展空间。

### （三）和谐共生，构筑新财经一流学科与一流专业建设新格局

以2018年6月召开的“成都会议”及其发表的《成都宣言》为标志，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风向标无疑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向。在此之前，“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全面展开，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学术研究的焦点和高校工作的重点；在此之后，一流本科教育、一流专业建设和一流人才培养，“金专”“金课”“建高地”和“双万计划”，成为热点、焦点和重点。诚然，“双一流”和一流本科教育都是我国高等教育孜孜以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高教强国、实现美好教育的核心内涵，但两者在办学理念、战略目标、发展路径、改革举措和资源配置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特殊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

学科与专业是高等教育领域中最为基础和核心的一组概念，共同构成高校的组织肌理与微观子系统。学科与专业的数量与规模、结构与层次、质量与水平，既是一个国家（地区）高等教育整体实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又决定着高校的办学类型、规模结构、层次地位和社会声誉。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支撑世界一流大学，众多一流大学达成高教强国目标。世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与一流专业的生成、维持与发展，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大国崛起的历史长河中，在现代工业与科技革命的时代大舞台上，在大学与经济社会交互影响以及自身的变革图强、创新发展中实现的。新财经教育，需要由学科与专业的原点出发，不断探索和深化学科、学科体系、学科模式、学科组织、学科制度、学科动力，专业、专业体系、核心课程、专业能力、专业变革、专业优化的创新路径，以学科夯实专业、以专业奠基学科，和谐共生，构筑起新财经一流学科与一流专业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格局。

### （四）协同共进，铸就新财经高质量发展共同体

70年来，我国财经高等教育一方面是规模庞大、成就巨大，在博士、硕士、本科、专科层次，财经学科专业设置率分别达25.60%、41.23%、88.89%和81.88%；另一方面呈现“不平衡不充分”的阶段性特征，“不平衡”表现为专业设置的“冷与

热”、学科生态位的“疏与密”、地域布局的“多与少”，“不充分”体现为办学层次的“高与低”、学科水平的“强与弱”和学科特色的“异与同”。<sup>[46]</sup>在一流财经学科建设队列中，既有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为代表的瞄准世界一流的高校，也有江西财经大学、安徽财经大学等一大批瞄准国内一流的高校，还有数量众多的应用型、技能型的区域性重点院校和职业技术学院。这些高校虽然定位不同、层级有别，但经世济民的学科属性是相通的，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组成了新财经教育高质量发展共同体。

面向未来，亟须以一流为引领，铸就新财经高质量发展共同体，动员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实践者、研究者和广大参与者协同共进，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构建起纵横交错、虚实结合的多元多层新财经教育体系。这种纵横交错、虚实结合的多元多层新财经发展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主体。一是全国性、官方设立的教育教学指导性委员会，它们是一流学科与专业建设的主导性力量，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2018年11月成立的2018~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定位于“参谋部、咨询团、指导组、推动队”，涵盖2个综合类、109个专业类和40个分教指委。其中，设有经济学类、财政学类、金融类、经济与贸易类、统计学类、工商管理类等6个教指委及会计学分委员会，由财经学科各个领域的知名高校、知名专家构成。二是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下设立的二级学会组织，如中国财商教育中心、高等财经教育分会、高等商科教育分会，在中心、分会下面又设立若干个专业协作组织，如高等财经教育分会的成员单位高达57个，涵盖所有财经院校。三是各式各样的协同协作组织，既有全国性的财经院校联盟，也有专题性的协作组织，如财经一流学科建设联盟、财经高校国际化联盟、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联盟。四是地区性、区域性的财经协同协作组织，如四川财经职业教育联盟、钱塘江金融高等教育联盟等。

## 参考文献

- [1] 周德昌主编《简明教育辞典》，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第176页。
- [2] 杜希民、尹伟巍、于东红：《高等教育多重解读和内涵》，《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4~7页。
- [3] 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第1~5、479~485页。
- [4]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序。
- [5]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第158页。
- [6] 梅贻琦：《大学一解》，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第15页。
- [7] 赵家璧：《中国大学之清算》，中国学生社编辑，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3，第1~3、16页。

- [8] 李均、王超:《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史研究的进展》,《大学教育科学》2005年第2期,第67~70页。
- [9] 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第3页。
- [10] 吴立保、姜宁:《移植与融合:我国近代大学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高教探索》2012年第6期,第88~93页。
- [11] 樊艳艳:《双重起源与制度生成——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起源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第19页。
- [12] 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第5页。
- [13] 张晓萌、李少杰:《扎根中国大地创办新型高等教育——“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80年论坛”会议综述》,《中国教育报》2017年10月19日,第5版。
- [14] 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245~271页。
- [15] 《历史沿革》,山东大学官网, <http://www.sdu.edu.cn/sdgtk/lsyg.htm>, 2019年3月20日。
- [16] 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第7~11页。
- [17] 严蔚刚:《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综合改革》,《高校教育管理》2017年第1期,第1~6页。
- [18] 段雅萍:《图书分类法发展历程回溯》,《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1年第8期,第186~188页。
- [19] 左玉河:《西学移植与中国现代学术门类的初建》,《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第96~101页。
- [20] 肖朗:《明清之际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的传入及其影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79~188页。
- [21] 秦利群:《中国近现代图书分类法发展历程》,《晋图学刊》2007年第2期,第72~75页。
- [22] 斯日古楞:《中国近代国立大学学科建制与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62~127页。
- [23] 刘建本、许康:《国立商学院院史(1937~1946)》,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 [24] 侯欣一:《民国时期法政学堂的功与过》,《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第31~33页。
- [25] 安新予:《清末法政教育的兴起》,《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45~53页。
- [26] 赵永利:《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研究(1917~1937)》,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绪论第4页。
- [27]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第370、571、407~408页。
- [28] 冯开文:《中国民国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第9、188页。
- [29] 唐德海:《中国高等学校课程设置百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170~171页。
- [30] 教育部:《大学科目表》,正中书局,1946(民国三十五年),第26~27、32~33页。
- [31]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第270、78~87、273页。
- [32] 郭振雷:《我国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的演变——兼论目录对高校专业设置数量的调节》,《现代教育科学》2013年第2期,第44~49、54页。
- [33] 别敦荣、杨德广:《三十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就——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3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前言第1页。
- [34] 周光礼、吴越:《我国高校专业设置政策六十年回顾与反思——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高等工程教育》2009年第5期,第62~75页。
- [35] 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一司:《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 [36] 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1993年7月颁布)》,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1998年颁布)》,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38] 忻福良、朱宁:《我国近、现代的专科教育》,《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48~52页。
- [39] 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文科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1994年颁布)》,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 [40] 周承业、张守贵:《全国专门人才现状》,载张健主编《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第326页。
- [41] 迟刚毅等:《高等学校文科教育》,载张健主编《中国教育年鉴(1985~1986)》,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第411~414页。
- [42] 《全国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中国教育在线, <https://www.eol.cn/html/g/tszy>。
- [43] 刘志文:《自主与依附的抗争: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发展道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6~21页。
- [44] 钟登华:《新工科建设的内涵与行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年第3期,第1~6页。
- [45] 王之康:《新文科:一场学科融合的盛宴》,《中国科学报》2019年5月8日,第1版。
- [46] 陈益刚、黄星繁:《“双一流”进程中一流财经学科的创新之路探析》,《高等教育评论》2019年第1期,第76~92页。

## A Retrospection on the Centurial 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China and a Future Look at Its First-class Road

*Chen Yigang Bai Yu Chen Xinpeng*

**Abstract:** The modern university of China was born in tough times when the unrest and insults from home and abroad intertwined. It was the product of the times wh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were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The centurial history of higher finance and economics education is rough and devious and it was express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ShangXiang (Chinese ancient university) to Academy, circuitous formation from school to university, subject transition from “the study of four parts” to “the study of seven subject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from law and business education to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then to economic management subjects, the gradual push from subject to the key subject and then to the world first-class subject and the elaboration from the major to characteristic specialty and then to the double first-class plan, from which we can learn much precious experienc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we can see that the world is faced with great unprecedented changes. . The historical mission requires us to set foot in the new era and lea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new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ke root in China and grasp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ew financial era, build a new pattern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s and majors in new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of new finance and economics.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Educational History; New Finance And Economics; First-class Discipline; First-class Specialty